

唐五代敦煌的祆教文化^{*}

解 梅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内容摘要】敦煌是古代亚、欧大陆陆路交通的咽喉和桥梁,西域各道“总凑敦煌”,自汉代开始中亚粟特民族因商业活动不断地向敦煌迁徙,至唐五代达到高潮并建立粟特聚落。随着粟特人的不断移徙入居,祆教文化在敦煌一带兴盛。

【关键词】敦煌 粟特人 祆教

中图分类号: B9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7)12-0110-02

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民族,即汉文史籍所称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昭五九姓”,以善于商业活动而著称,被称做“东方腓尼基人”,史载“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1]

长期以来,粟特商队于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进行着频繁的商贸活动,他们在丝路沿线建立了许多移民点。如敦煌本 P 0367号《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在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的地方建立了粟特人聚落石城镇。另外,康艳典还筑了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的新城,离石城镇四里的蒲桃城,以及在石城镇东南四百八十里的萨毗城。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门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

粟特人所建聚落中最典型的当属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根据P 3559《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敦煌县差科簿》所记载从化乡人名的姓氏多为粟特式胡名,判断从化乡是中亚胡人聚落,并认为粟特人作为一个聚落在吐蕃占据敦煌时已基本消亡^[2]。但据郑灿林先生研究,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在行政建置改唐代的乡为部落制后,诸部落中普遍有粟特人居住^[3]。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还有曹家庄、安家庄、康家庄、史家庄、石家庄等,说明粟特人的势力并未因从化乡的取消而削弱,而是有所发展。

8世纪以后的粟特裔民仍保持着明显的商业特色,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粟特人多集中在丝绵、行人等部落中,他们主要从事丝绸和棉麻布的生产。归义军时期敦煌城中有许多粟特人开的酒店:康家店、石家店、何家店、罗家店、曹家酒店、安家酒店,以及石狗狗、石墨儿、史丑煞、史盈字等酒店,酿制酒的品种繁多,但以葡萄酒、胡酒最具特色。除此之外,他们还充斥于归义军出使的使团或商团之中与周边地区进行商业贸易。同时,粟特人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对该地区的政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而敦煌的粟特人是归义军政权的支柱之一,归义军政权统治者张议潮的生母就是粟特人安氏,粟特人在收复河西,建立归义军政权的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归义军政权中上至高级官吏,下至低级胥吏无不充斥着大量的粟特人。如张氏归义

军时期担任节度副使的安景曼,担任瓜州刺使的康使君、历任番禾镇将、删丹镇遏使的康通信、左都押衙安怀恩等。

处于中亚河中地区的粟特人皆信奉祆教。史载:“又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总事火袄。”^[4]

关于火袄教入华的时限,学界已有深入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陈垣先生在其《火袄教入中国考》一文中认为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5]。上世纪50年代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进一步考得祆教入华始于十六国时期^[6]。上世纪90年代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又考得祆教入华最晚是在西晋末叶^[7],稍后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祆教在中国的初传》又将祆教入华的时段提前到3世纪初^[8]。无论祆教何时传入中国,作为中西交通要冲、商贾总凑之地的敦煌无疑是祆教最早入华的地区之一。

根据荣新江先生研究,早在4世纪初叶,敦煌就有了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自治聚落,而且伴随有祆教祠舍^[9]。随着粟特人在敦煌的活动,他们所信奉之宗教也进入了敦煌。

唐五代宋初,伴随粟特聚落在敦煌的正式形成,祆教文化在当地非常兴盛。P 4640《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保留了公元899~901年张承奉时期赛祆活动中支出“画纸”的记录,辛酉年(公元901年)从正月到四月每月都要举行一次赛祆活动,说明在粟特胡人的宗教信仰影响之下,敦煌的祆教信仰非常流行。P 2005《沙州图经》记载在沙州城东一里的地方有一座祆教神庙,为粟特民众精神信仰的中心,“其周迴一百步”,约合150米,池田温先生认为可能是一个正方形庙宇^[12]。祆庙内一年四季都悬挂有画着粟特神祇的白画,并时常举行设供、燃灯、“雩祭”等祭祀活动。

设供主要是神食和酒,神食一般包括猪肉、羊肉以及具有中亚风格的“灌肠”;酒则是祆教祭祀时朝夕不可离缺的物品。文书中留下了大量记载,如P 2569《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附判词》:“四月十四日,夏季赛祆用酒肆瓮。”P 2629《酒破用历》:“城东赛祆神酒两瓮。”敦煌研究院藏《酒破用历》记“城东赛祆神酒壹瓮。”P 3929《敦煌廿咏·安城祆咏》更有“朝夕酒如绳”的描述,意思是说从早到晚祭祀的酒长流不断就像绳子一样。

“祆庙燃灯”是赛祆活动中的另一项仪式。S 2241记载10世纪回鹘公主君者者在私信中请求北宅夫人为她在

* 本文系兰州理工大学硕士基金项目(SB200410)资助。

袄庙中燃灯祈求袄神“沿路作福”保佑她旅途平安。归义军政府还专门支出一定的灯油用于袄庙燃灯。S 1366《归义军使衙内面油破用历》：“十七日，准旧城东袄赛神用神（食）五十七分，灯油一升，抄面二斗，灌肠九升。”S 2474《归义军使衙内油粮破历》记载：“城东袄灯油二升。”如所周知，中亚本土袄教以神圣的火为惟一崇拜的对象，显然在袄庙中燃灯是中国袄教徒根据对袄教教义的理解以燃灯的方式来表达对圣火的崇拜，对光明的追求，“袄庙燃灯”有礼拜圣火的含义。

从P 3929《安城袄咏》“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的诗句中，我们得知赛袄过程中还举行一项“雩祭”的活动。敦煌与粟特本土中亚同为干旱地区，降雨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故而雩祭不仅是袄教固有的赛神仪式，而且也是袄教入华后在敦煌大受重视的一项活动。袄教有司雨之神即“星辰雨水之神”，也就是汉文史籍中所称的“得悉神”^[10]，亦应是敦煌百姓雩祭之神。《高僧传》卷10《神异下·涉公传》载：“涉公者，西域人也。……能以秘咒，咒下神龙。每旱，（苻）坚常请之咒龙，俄尔龙下钵中，天辄大雨”，这位来自西域的涉公有求雨的本领。敦煌袄祠祠主可能也掌握了呼风唤雨之术，参与祈雨，并与古老的岁时祈雨方式“雩祭”相结合。

祭祀完毕后，信徒们开始丰富多彩、热闹非凡的祈福活动，他们反弹琵琶，横吹鼓笛，酣歌醉舞，并且选出一位胡人为“袄主”进行惊险刺激的幻术表演，因幻术表演所展现的幻象、幻境，往往给人以神奇、灵异的感觉，使看者深信不疑。《朝野僉载》卷3《洛阳袄祠》记载初唐洛阳和凉州赛袄时都有幻术表演，虽然目前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敦煌赛袄中幻术表演的直接记载，但从P 2748《敦煌廿咏》中的《安城袄咏》“频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可知袄神在敦煌百姓

心中还是相当“灵验”的，故而才出现“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的状况，而这种灵验的感觉无疑与敦煌赛袄活动中的幻术表演有关。

从上可知敦煌的赛袄活动主要包括设供、燃灯、雩祭、幻术表演、祈福等仪式。

以上仅是对唐五代粟特人及其宗教在敦煌发展的一个简单概述。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粟特语文献和有关唐五代宋初敦煌粟特人活动状况的文献，可以说研究敦煌的粟特人和袄教，是民族史、宗教史及敦煌学史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一课题还有待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而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新唐书》卷221《西域传》。
- [2]（日）池田温撰，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A].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3]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M].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 [4]（唐）慧超，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M].
- [5]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A].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
- [6]唐长孺。魏晋杂胡考[M].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
- [7]荣新江。袄教初传中国年代考[J].国学研究（卷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8]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袄教在中国的初传[J].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
- [9]荣新江。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M].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出版社。
- [10]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中华书局，1998年。

（上接第109页）研讨会几乎每年都有，主题内容广泛，涉及到敦煌遗书档案、石窟保护、美学艺术、敦煌文化、佛教艺术、学术史等等。甘肃的行政、文化、学术机构积极踊跃地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或者独立承办，或者联合承办，邀请省内外、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所有这些学术会议，对于活跃学术气氛、加强信息交流、掌握学术动态、启示研究方向、提高学术水平、推动甘肃敦煌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000年敦煌研究院举办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等举办的“海峡两岸敦煌学丝绸之路学术考察研讨会”，总结了敦煌学百年历程，在敦煌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举办学术会议的同时，甘肃敦煌学界继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展开与省内外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多批次接待来甘肃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的兄弟省市以及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原苏联、意大利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敦煌学专家学者，与之进行学术交流；另一方面，多批次派出专家学者参加兄弟省市和国外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考察访问，举办敦煌艺术展览。

所有这些内外交流活动，对于甘肃敦煌学界开阔眼界、扬长补短、展示和提高研究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在看到敦煌学发展特点的同时，还必须要看到不足，本世纪初时已有学者关注这样的问题^③。笔者赞同之外，还想提出两点：其一，宣传敦煌文化和敦煌学的力度和深度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其二，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经济实用产品。

敦煌是甘肃的品牌，但是真正了解古今敦煌的人并不多，知道敦煌学的人更是少之有少。我们现在必须要确立与时俱进的思路：敦煌学不仅为现代人展示古人的生活，而且更要为当代人创造经济效益。在宣传敦煌学方面，目前一些高校为个别专业的本科生开设“敦煌学”课程，有一定成效，也使学生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了敦煌学的价值。笔者认为从高校入手加大宣传敦煌及敦煌学的力度是值得提倡的作法。如何使研究成果及时带来经济效益，笔者认为需要学者与商家共同努力创造以“敦煌”为标志的文化经济模式。目前更多的是商家利用学者的研究成果时，没有很好地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只是现象的复制。而学者则往往因为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地传播这种文化的魅力。因此，笔者这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希望本世纪敦煌学的发展能弥补过去的不足，继续将来的辉煌。

注释：

- ①颜廷亮。甘肃的敦煌学研究概述[J].敦煌研究，1995年特刊。
- ②颜廷亮。甘肃敦煌学：走自己的路[J].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期；杨秀清。蓬勃发展的甘肃敦煌学研究[J].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期；高干。陇上敦煌学的回顾与思考[J].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李并成。新世纪敦煌学发展的若干断想[J].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
- ③高干。陇上敦煌学的回顾与思考[J].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李并成。新世纪敦煌学发展的若干断想[J].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冯培红。敦煌学与甘肃，2002年8月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提交论文。